

## 弗洛伊德哲学与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

宁晓萌/文

**提 要:**对梅洛-庞蒂而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治疗的手段或方法,而更意味着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他在弗洛伊德哲学中看到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关于“人的现象”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直接与梅洛-庞蒂后期关于“肉身”的存在论研究分享了共同的旨趣和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型。本文试图追述梅洛-庞蒂对弗洛伊德的理解与批评,从而分析他如何逐步从弗洛伊德哲学中获得了概念、方法和理论构造上的启示,并最终在其“力比多的身体”、“肉身概念”等一系列后期概念和论题中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深化为一种“交织”的存在论。

**关键词:**身体;肉身;断裂

**中图分类号:** B565.5

**文献标识码:** A

在梅洛-庞蒂哲学中,存在着两个看起来非常接近的身体概念,即其早期的“身体”(le corps)的概念与晚期的“肉身”(la chair)概念。相比较而言,“身体”概念,由于得到了较为系统和充分的说明,往往被人们看作是比较清晰的,而“肉身”概念,对于梅洛-庞蒂著作的读者而言,则由于不仅在文本说明的篇幅和系统性上都未能像前者那么充分,并且其概念构造及说明的方式亦采用了不同以往的风格,故而显得有些晦涩难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关于“肉身”概念的关键性的论述,就成为理解“肉身”概念及其所参与构造的梅洛-庞蒂后期哲学的至关重要的通道。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些关键性论述中,频繁出现了关于弗洛伊德哲学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虽然在之前的著作中亦时有提及,却从未像在其中后期的课程和著述中来得那么集中和深入。甚至在1960年末为《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准备的工作笔记中,梅洛-庞蒂直接指出:“弗洛伊德的哲学不是身体(le corps)的哲学,而是肉身(la chair)的哲学”(Merleau-Ponty, 1964: 318)。本文的讨论,即从这句话开始,由这一简短的论述入手,分析弗洛伊德哲学之所以能够代表“肉身”哲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并由此探讨缘何弗洛伊德哲学能够成为梅洛-庞蒂后期哲学所借鉴的范例,以及这种哲学给梅洛-庞蒂所带来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架构上的启示。

### 一、弗洛伊德与人的概念的发展

自其哲学生涯的早期阶段,梅洛-庞蒂已经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梅洛-庞蒂中期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4BZX112)阶段性成果。

他不止一次地呼吁，应该看到一种“弗洛伊德哲学”，而不仅仅是市面上流行的精神分析方法。在其 50 年代以来的课程、会议文章以及最后的著作中，梅洛-庞蒂一直在不断地回到弗洛伊德，并且越来越具体和深入地挖掘其精神分析理论及基本概念的构造和意义，从中看到对“人”这个概念非常深刻而极具现代色彩的挖掘，并由而一次又一次地揭示出弗洛伊德哲学与现象学研究的共同旨趣。

在 1951 年 9 月的日内瓦国际论坛上梅洛-庞蒂做了《人及其厄运》的报告，并在此报告中清楚而直接地表达了他对于在 20 世纪构建关于人的知识的忧虑与建议。他特别说明：

我们所能做的是，以选定的二三种关系，在我们之中标划出人类处境的各种变化。我们将不得不给出大量的解释和评论，从而消除众多的误解，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概念体系间作翻译转换的工作，从而在，譬如说，胡塞尔哲学与福克纳作品之间，建立起客观的联系，让他们通过读者来相互交流。在第三者的观察中，这些看似对立的人（譬如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也表现出共同之处，因为他们都牵涉在同一文化处境之中。（Merleau-Ponty, 1960: 367）

透过这段少见的关于方法的直接说明可以看到，对梅洛-庞蒂而言，同时代思想和理论，无论它们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却始终面对着同样的危机，分享着共同的文化处境，并实际上是在为着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他在现象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间所看到的一致性恰恰就在说明这一点。事实上，对于两种理论间一致性的讨论从《知觉现象学》开始直至 1960 末一直不断地重复。这种重复本身提示着我们，梅洛-庞蒂极有可能一直在作一种方法上的尝试，即胡塞尔与弗洛伊德恰恰成为他所“选取的两三种理论”中的代表，对二者间共同之处的发掘，也恰恰意味着一种对于这一时代关于“人”的共同认识的研究。

在梅洛-庞蒂看来，“本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唯物论’与‘观念论’、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间一种全新的结合，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对题的消解”（Merleau-Ponty, 1960: 367-368），而在“身体”的概念上，这种显著的特点就体现为“‘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不再那么分明了”（Merleau-Ponty, 1960: 367-368）。对他而言，“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意味着（机械论意义上的）动物性+理智”（Merleau-Ponty, 1994: 269），“人”的存在并不仅仅在于其精神的或理智的一面。而作为 20 世纪思想家之一的弗洛伊德，恰恰最大的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人如何同时既完全是精神的又完全是身体的”（Merleau-Ponty, 1964: 370）。

针对人们对弗洛伊德理论最常见的误解，梅洛-庞蒂指出，“说弗洛伊德想要把人的发展建立在本能发展的基础上，这并没有错；但如果我们能看到从一开始他的著作就颠覆了本能的概念，取消了他之前人们以为能用于界定本能概念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更进一步了。”（Merleau-Ponty, 1960: 371）事实上，弗洛伊德本人对此早已给出了清晰的论述。在写作于 1915 年的《本能及其变化》一文中，弗洛伊德注意到本能“并非起因于外部世界，而是来自于有机体自身内部”，这与通常我们所了解的“心理刺激”的表现大为不同，后者更多表现为我们通过外部观察所发现的偶发（突发）和暂时性的外部的冲撞，而本能则恰恰以其恒定性为特征。正因如此，本能才更被揭示为一种发源于内部的持续的冲击力，它不能单凭外在的观察而被研究。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指出，“对于本能刺激更好的描述应该

是‘需要’”，而“对于这种需要的解决则是在于‘满足’”（Freud, 1985: 117）。尽管这样一种论述并不能直接为本能的研究提出清晰明确可操作的方法，但梅洛-庞蒂却从中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即，本能并不单纯意味着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而是要求人们从更本原和内在的角度去考察这种现象。基于这种理解，弗洛伊德对于“性”的描述向我们揭示出，“性”更是“充当我们生存基础的肉身性”，就其原始动机而言，性“首先是一种绝对而普遍的投入能力”（Merleau-Ponty, 1960: 371）。在此意义上，“性”的最初呈现不再被简单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或单纯的生理现象，而更被看作对于某人（或某物）最初的向外投射和诉求本身。正因如此，梅洛-庞蒂更愿意从一种存在论的层面上来理解弗洛伊德对“性”这一基础概念的解释，并不止一次地为他辩护，精神分析理论绝不是一种泛性论，“性”不是人的行为的最终原因，也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我们生活的载体，支点和方向盘”。与其说弗洛伊德关于“性”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套解答人类活动奥秘的手段和方案，不如说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的概念”，即“同时既完全是精神的又完全是肉身的”“人的概念”。在此，性，不是人的概念中的局部，而是在其内部将其构造整体的东西。作为最原初的想要与……联系起来的“需要”，性从一个非常基本的维度上标划出人的存在的独特性，即发源于人的存在内部的欲求。

## 二、“人的身体”

自1956年起，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关于“自然概念”的系列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越来越清晰和具体的“人的身体”的概念在其考察中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梅洛-庞蒂之前的“身体”概念从字面上非常接近，只是加了“人的”这一限定。人们往往由于想当然的认为在此所谈论的“身体”原本就是指人的身体，而忽略了这种表述上的变化所意味的理论上的进展，忽略了“人的身体”概念其实已经蜕变为一个新的概念。对梅洛-庞蒂而言，人的存在最为本己的特征即在于“把自己展示给自己”（Merleau-Ponty, 1960: 366），在于其返回自身，反思自身。而就其原始形态而言，这样一种返回自身只能在身体性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因此对他而言，“人首先作为身体性存在，然后才是作为理性存在”，这意味着要“将人性理解为作为身体存在的又一种方式，看到人性就好像水印一般的存在（从身体存在上）浮现出来，不是作为另外一种实体，而是作为交互的存在（interêtre），它不是在一个自在的身体上加上了一种自为。”（Merleau-Ponty, 1994: 270）也就是说，梅洛-庞蒂不希望以一种“动物性+理性”的方式来明人之为人最根本的特质。人的概念，不是通过几个种属特征的机械叠加就可以完成的，他在此所指出的“交互的存在”恰恰不是这种机械意义上的叠加，而是一种交织（Ineinander）。在此意义上，他在其哲学生涯的最后阶段重新回到“身体”概念的考察，并非是对其早期概念的重复或简单修订，而是旨在拓展一种新的研究——“人的身体”意味着“作为能触-被触、能看-被看的身体”，“这是反思发生的地方，并进而是身体得以将自己与别的东西联系起来，得以在一种感性的外观中使视看的回路得以封闭起来的地方”，总体而言，这是一种“肉身（la chair）的理论，是一种关于作为可感性（Empfindbarkeit）的身体及其所关联的事物的理论”（Merleau-Ponty, 1994: 271）。

在1959-1960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自然与逻各斯：人的身体”（Nature et Logos: Le corps humain）中，梅洛-庞蒂以几乎同样重分量的篇幅对身体概念展开了相互关联的两个

层面的讨论，即，“感觉层面的身体”（le corps esthésiologique）和“力比多的身体”（le corps libidinal）。在延续了胡塞尔进路的“感觉层面的身体”的讨论中，梅洛-庞蒂特别注意到，在胡塞尔式的共感理论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在感知另一个身体、或被另一个身体所感知，也不单纯是一个能构建的心灵与另一个能构建的心灵相遇，而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谋面、相认和共同感知。在此意义上，“共感”的问题实质上是让我们以最质朴的方式去面对关于他人的经验，作为感知者和可感者的其他的人，而不是其他的身体、心灵或思想。尽管梅洛-庞蒂并不全然认同胡塞尔关于交互主体性和他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却从共感问题的讨论中获得了极大的启发。对他而言，胡塞尔在此问题上的贡献在于，他让我们从最初始的肉身关系的层面去思考人与人的关系，让我们在这一最初和最表层的阶段对他者的问题，他揭示出“对他者的经验首先是‘从感觉层面而言’的”（Merleau-Ponty, 1960: 278），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共感之谜的全部就在于其最初阶段——感觉层面的阶段，其解答亦在这阶段，因为这是一知觉。‘构置’另一个人的是知觉主体，另一个人的自身被‘构置’成‘能知觉者’。关键从来就在于共同知觉（co-perception）”，在此意义上，“共感的问题转移到感性的沉思上去”（Merleau-Ponty, 1960: 278）。胡塞尔试图透过“共感”的理论揭示出一种主体间原初的肉身化联系，并以此作为解决他人问题或交互主体性问题的通路。这启发了梅洛-庞蒂去关注“感觉层面的身体”，致力于一种关于源基感觉（Urempfindung）的研究，这正是其所谓“感觉层面的身体”和建立一种“感觉学”（esthésiologie）计划的意义所在。

然而这种“感觉学”并不意味着梅洛-庞蒂在身体和建立在身体性基础上的他人问题的研究的结束或告一段落，相反，作为一种在最初始层面揭示问题的努力，这种感觉学的进路恰恰成为一种研究的肇始。梅洛-庞蒂随即在胡塞尔藉以解决问题的地方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胡塞尔而言，“双重感知”的现象为我们揭示了身体透过触摸到自身的触摸（两手相触）而实现了最原初的返回自身的体验。这为他所希望建立的能够在自身之中进行纯粹的反思（返回自身意义上的反思）的纯粹的身体性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然而梅洛-庞蒂却从“双重感知”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sup>①</sup>。对他而言，即便是在胡塞尔颇为青睐的触觉中，也并没有纯粹的返回自身：

身体这种朝向自身的回返往往最后以失败告终。就在通过右手感觉到左手的那一刻，我停止了左手对右手的触摸。然而这最后一刻的失败并没有剥夺“我能触摸到自己正在触摸”这种预期的全部真实性：我的身体并没有知觉到，但作为知觉的基底，它穿透知觉形成自身；通过其内部的安排、其感觉运动的各种通路、其操控和推进运动的各个线路，它为自己准备了一种关于自身的知觉，就好像从来都不是他在感知，或感知到这一切的不是它自己。（Merleau-Ponty, 1960: 24）

亦即是说，梅洛-庞蒂并不认为在双手相触的双重感知中能真正实现一种纯粹内在的回返，

<sup>①</sup> 梅洛-庞蒂对于身体自身的反思性特质的研究始于他对胡塞尔未刊文献的阅读，并且这种研究从他的早期著作一直持续到最后。自始至终，胡塞尔现象学以及身体的反思性特质在他的研究中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此标画一种分歧，并不意味着对于胡塞尔及胡塞尔进路的否定或放弃，而是旨在说明梅洛-庞蒂在这种启示之下更加深入的发展。

左手的触摸与右手的触摸并不是同时向我们呈现，我们始终只能在两种感知中的一边。所以在此经验中，或许我们仍然能够触摸到另一只手正在触摸，但却并不能因此说我们通过这种触摸真正回到自己。在此意义上，“触摸与触摸自己……并没有在身体中重合：触摸永远不会成为被触摸者。这也不意味着它们‘在心灵中’或‘在意识的层面’上重合。为了这种结合，我们需要诉诸某种身体之外的东西：这种结合发生在不可触及之处（l'intouchable），那是我永远触碰不到的他者。”（Merleau-Ponty, 1960: 302）在触摸中返回自身的意图，并非仅仅在一个内在封闭的循环中实现，而是必然借助一个自身之外的他者，返回自身的活动完成于对那个未曾触及的他者的诉求中。或许正是考虑到这种最初的并且无可回避的对于他者的诉求，梅洛-庞蒂在“感觉层面的身体”之外开启了诉诸于“力比多身体”的研究，对他而言，“力比多的身体”为我们提供“欲求的我”（le je de désir）<sup>②</sup>，从而可以展示在身体之中也存在着“为-他（pour autrui）的自然根源”（Merleau-Ponty, 1994: 272）。在这样的考量下，“身体作为共感之能力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欲求，性欲（力比多），投射-内投射，自我认同。人的身体的感觉层面的结构因而也是一种力比多（性欲）结构，感知因而也是一种欲求，是一种与存在的扣连而不仅仅是对存在的认识”（Merleau-Ponty, 1994: 272）。所以对于梅洛-庞蒂而言，关于“感觉层面的身体”的研究与关于“力比多的身体”的研究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如果说前者意味着一种从“正面”展开的研究，那么后者则意味着一种“重新研究”（réinvestissement），它从反面、诉诸于一种内在于身体的视角，亦即一种刚好来自于前者背面的角度，再度展开前者已经开启的研究。

这种对于“力比多的身体”的研究尽管未曾得到真正充分的发展，我们却可以从梅洛-庞蒂对弗洛伊德对儿童与父母的原初联系的分析中看到其特别意义。在梅洛-庞蒂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一种“自我的心理学”，这种自我自其最初阶段就与他者纠缠在一起。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自我概念（本我、自我、超我）恰恰向我们展示出这种自我与他者交织在一起的发展。在梅洛-庞蒂看来，这些自我概念，“并非三种外在的事实，而是同一段人格生活的辩证法的三个方面”（Merleau-Ponty, 2001: 337）。在三者之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超我”的概念，它在“自我”概念的体系中充当着“一种理想的自我，我期望成为的那个我，我的榜样”，“代表着我所仰慕和认同的父母性格，它在自我之中起着引导的作用”（Merleau-Ponty, 2001: 330）。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并非总是我完全有意识的、对自己清楚呈现出来的理想（人格），而是我趋向着去成为的（那个人），是我想要向他和在他面前表演的（那个人）。超我是我生活中感情上理想的对象，是我所有主要活动指向的目标。……并且超我不是一个外在的因素，因为它是由自我在其自身之中引入的”（Merleau-Ponty, 2001: 338）。即超我意味着一种原始地朝向他人的联系，但却并非来自于外部。在自我本身的发展中原本就存在着这种朝向外部、朝向他者的自然根源，并且这种为-他的根源在自我的发展中不但不是次要的因素，反而还对自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对“超我”概念在“自我”概念中作用的特殊考量，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作为儿童在性的方面与父母间最初的联系，实质上意味着一种对于他者最初的诉求（在此，父母扮演着最初的他者的角色，并且往往是作为榜样和理想人格）。相应地，在此意义上所

<sup>②</sup> 这种说法明显与《知觉现象学》中关于身体的表述——“自然的自我”（un moi naturel）、“知觉的主体”（le sujet de la perception）——形成对照。



说的“性”，也仅仅体现为其最朴素层面的含义，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或许这个概念最合适的描述应该是‘与两种性别间差异有关的一切’”（Freud, 1966: 376）。在此意义上，对于儿童早期阶段的性的特征的揭示，并不意味着把儿童卷入情色的处境中，而是恰恰意在说明，在这些活动中凝结着儿童两个方面的最初认识，一是对自己性别的认定，一是对自己不是的性别的好奇与研究。“性”的概念因而也成为一种对于人类存在方式中交织特征的展示：作为对他者最初的诉求，性被看作是朝向他人的活动的肇始；同时，由于在自我的发展中，已经存在着他者的参与和引导，所以这种朝向他者的诉求也同时具有自我保存、自我认同和自我反省的意义，即最初意义上的自恋。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性被弗洛伊德揭示为在儿童非常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已经在起作用的活动，所以它从一开始即已经嵌入人的全部生活，它自身也因而作为一种实存论因素历史性地存在着，它已经就是一个人自身本有的生涯和历史。总体而言，透过性的概念，关于他者的研究、关于自我反思的研究以及关于历史性存在的研究汇聚在一起，一种把“人的身体”视为交织在自我-他人张力之中的历史性的存在的观点几乎已经成形，而这样一种构想正是梅洛-庞蒂后来对于肉身概念的预期。

### 三、否定性与“肉身”概念的构造

如前所述，梅洛-庞蒂在“双重感知”的现象中看到触摸与触摸自己的经验并没有在身体中重合在一起，为了促成二者的衔接，必须诉诸于其他的东西，亦即“不可触及的他者”。对他而言，“他者”意味着总是站在那个正在感知和欲求的“我”的背面的东西。而“在背面”，意味着这是某种永远不可能被置于“前面”或“正面”的东西，意味着这是一种绝对意义的否定性，它不是推衍而来的次生性的概念，而是一种同样绝对和原生的存在模式。这种否定性（触摸所不可触及的、视看所不能看到的、意识所不能觉察的）意味着不会再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肯定者，它恰恰在“可感存在的另一面或反面”（Merleau-Ponty, 1964: 303）活动，作为一种“隐匿者之不隐匿”（*Unverborgenheit de la Verborgenheit*）、“不呈现者之原初呈现”（*une Urprésentation du Nichtürprésentierbar*），这是一种“异的起源”（*un originaire de l'ailleurs*），一种“作为他者的自己”（*un Selbst qui est un Autre*），是一个“洞”（*un Creux*）（Merleau-Ponty, 1964: 302）。基于这种理解，否定性不再以一个正面论题的对题或否定的形式呈现，而是它本身就同样源始地是另外一种存在，它对存在的揭示，就好像“深度掏空自己的重量和尺幅来彰显自身”一样。在此意义上，否定性成为另外一种“开敞”，成为另外一种对于人的存在的构建，尽管是以匿名的和沉默的方式。梅洛-庞蒂对于“肉身”概念的构架，恰恰得益于这种否定性。正是通过将这种否定性纳入到建构性因素之中，梅洛-庞蒂才能以一种更根本和更深刻的交织存在的模式中塑造“肉身”的概念，而在这种构型过程中，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显然再度成为梅洛-庞蒂所选取的好的示范。

在一则1960年12月的笔记中，梅洛-庞蒂留下了他对于论述弗洛伊德的哲学的构想：“本我，无意识——自我，（这种相关性在肉身的基础上才能理解）”（Merleau-Ponty, 1964: 318）。对他而言，“心理学观念（知觉、观念——情感、愉悦、欲望、爱、爱欲）的整体构架，在人们停止以实证的话语思考、从而不再把它们看作是负面的或各种否定，而是看作各种附着于一个唯一而广阔的肉身存在的变化的时候，突然间变得清晰起来。”（Merleau-Ponty, 1964: 318）在此意义上，无意识并不意味着意识概念的对题，他更多看到的是已经由弗洛伊德本人所反复强调的无意识概念的系统意义。在《论无意识》中，弗洛伊德表明：

“它（无意识）不但指一般的潜伏观念，而且特别还指那些具有一定动力性质的观念；这些观念尽管强烈而活跃，但却不能进入意识。”（Freud, 1966: 543）也就是说，无意识本身即是一种充满活力、甚至自身有可能很强大的东西，而并不是仅仅由于微弱或被动的原因而未能进入意识。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区隔并非是一种静态的概念上的划分，而是当抵抗活动将之排斥在意识之外的时候才真正造成了我们称为无意识的东西。故而无意识这个概念本身即意味着其所界划的东西不会以任何形式转变为意识，也不被看作是存在于比意识更初级的层面上，就好像它作为尚未获得表达的意识，一经宣明，仍然能够转变为意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反复指出：“‘无意识’这个概念具有两种意义：一方面指向一种现象，另一方面则指一种系统”（Freud, 1966: 543），并且认为“我们应当从无意识一词的纯粹描绘意义前进到这一词的系统意义”（Freud, 1966: 365）。这种对于无意识概念的动力性和系统性意义的构造和说明，为梅洛-庞蒂提供了一种理论和概念构造上的示范。梅洛-庞蒂更倾向于用“间接的意识”（la conscience indirecte）来描述无意识，从而表明，无意识以“间接的”方式与（“直接的”）意识共同起作用，而并非二者在相继和转换的模式下起作用。“无意识”概念中的“无”，并不意味着“尚未”，而是指明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差异性，无意识就是以一种绝对在意识之外的方式、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另一种”方式默默地活动着。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梅洛-庞蒂不再像在《知觉现象学》阶段所做的那样，仅仅从弗洛伊德理论中获得一种支撑身体概念的底层架构，对于他的肉身概念的建构而言，弗洛伊德哲学的意义更在于提供了一种“超结构”（superstructure）（Merleau-Ponty, 1996: 152）。正是在这种“超结构”的考量之中，梅洛-庞蒂事实上已经走出了那种仅仅依赖“整合”（integration）的语言构造哲学的方式，而开始接纳“断裂”（disintegration）的语言。而“断裂”对他而言，并不意味着混乱或无序，而是断裂本身向我们展示出一种或许更加原始和深刻的秩序建构的方式。正是从弗洛伊德哲学这种更加开放的结构理论的方式（将否定性、断裂的因素纳入结构考量之中）中，梅洛-庞蒂获得了建构一种交织存在论的原始范型，并且他对于这种交织存在论的构建也能够给弗洛伊德哲学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拓展。

### 参 考 文 献

- Freud, S., 1966,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the standard edition, ed. & trans, James Strachey, W. W. Norton & Company.
- Freud, S., 1985,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in *On Metapsychology. 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James Strachey ed., English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V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1957), Penguin Books.
- Merleau-Ponty, M., 1960, *Signes*, Gallimard.
- Merleau-Ponty, M., 1964,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Gallimard.
- Merleau-Ponty, M., 1994, "Nature et Logos: le corps humain", in *Nature: Notes de cours de Collège de France*, éditions du seuil.
- Merleau-Ponty, M., 1996, *Notes de cours, 1959 - 1961*, Gallimard.
- Merleau-Ponty, M., 2001, "Les relations avec autrui chez l'enfant", in *Psychologie et pédagogie de l'enfant: cours de Sorbonne 1949 - 1952*, Editions Verdier.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何博超）